

宋代史学编辑出版事业的继承与创新

胡予琪

(开封教育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4)

摘 要 宋代在对历史资料和书籍的编辑方面,在继承前人成果、经验、方法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历史编纂学体系,在史料编纂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创立了“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的史书编纂新体式,郑樵的《通志》在纪传体通史方面有重大的继承与创新,“自成一言”。

关键词 宋代;史学编辑出版事业;继承;创新;长编;纪事本末体;纲目体;纪传体通史

中图分类号 G23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86X(2007)03-0095-03

0 引言

继承传统文化,是历代编辑家们的历史使命。自孔子编《春秋》时所树立的“中华一统”肇端,历代编辑家们无不把它视为不可动摇的准则。而在宋人的编辑意识中,“使九州合而为一统”^[1]的观念更为突出。如在哲学论战中提出的“道统”观,在文学评论中提出的“文化”论,在历史研究中提出的“正统”史观,无不是这种思想的表现。但是人们一提起赵宋王朝,便认为那是一个不值得称道的“积贫积弱”的时代。诚然,宋代并无显赫战功,不像汉、唐、元帝国那样疆域辽阔,称雄天下。然而,正如国学大师陈寅恪在《郑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所说的,“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2]。其在编辑出版事业上更表现出勃勃生机,在继承前人成果、经验、方法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宋人在对历史资料和书籍的编辑方面,在继承唐代注重修史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历史编纂学体系,创造了通鉴体、纪事本末体、纲目体、通志体等史书编纂体式,产生了一批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史学书籍。综观宋人历史编纂学在继承与创新方面的成就,下列诸方面的表现十分突出。

1 史料编纂取得了重要成果

1.1 形成编修当时国史完整程序

宋人特别重视对当时资料的保存和整理,形成了一套积累当时史料的完整体系:即由《起居注》、《时政记》而成《日历》,由《日历》编修《实录》,再由《日历》、《实录》编修国史的当代史编纂程序。正由于宋人修史制度较唐代进步,“故史料之丰冠绝古今”^[3]。

1.2 编出了几部重要的资料性史书

除了《国史》和《会要》之外,宋人还编纂了几部重要的资料性史书。

1.2.1 《续资治通鉴长编》

李焘编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是宋代第一部重要的资料

性史书。该书的编纂采用司马光做长编的方法和原则,“宁失之繁,毋失之略”。^[4]作者广泛收集材料,除《实录》、《国史》、《会要》等官书外,文集、笔记等私家著述也包揽无遗,详尽地记述了北宋一代的史实,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1.2.2 《建炎以来系年要目》和《中兴小历》

接续李焘《长编》而专记南宋高宗朝史事的,有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目》200卷,熊克《中兴小历》40卷。《建炎以来系年要目》尤具价值。这是一部内容翔实,笔法精审的断代史,专记南宋高宗一代36年统治的史迹。李心传在编纂此书时不仅充分利用了《日历》、《国史》等官方资料,还大量参考了各类野史、杂记。他对史料的处理非常审慎,据《朝野杂记》卷首说,他采用了“可削者辨之,可信者存之,可疑者阙之,集众说之长,酌繁简之中”的方法。凡对记述不同的史料,逐条辨证,附注其下。

1.2.3 《朝北盟会编》

与《建炎以来系年要目》和《中兴小历》同时,还有一部珍贵的资料书,即徐梦莘编辑的《朝北盟会编》。这是一部记述徽宗、钦宗、高宗三朝与金国交涉和战问题史实的专书,记载起自政和七年(1117)宋与女真从登州泛海结盟,迄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金人南侵败盟,共46年史事。徐梦莘编辑此书的目的和方法,他在自序中说得很清楚:“其辞则因原本之旧,其事则集诸家之说,不敢私为去取,不敢妄立褒贬,参考折中,其实自见,使忠臣义士乱臣贼子善恶之迹,万世之下不得而湮没也。自成一书,以补史官之缺,此《会编》之本意也。”^[5]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徐梦莘的编辑思想充满着爱国主义的激情,包含着正直编辑家的高尚品德。其一,他要通过此书,让那些被官方国史所歪曲和遗弃的史料公诸于世,“以补史官之缺”。其二,他要通过此书,让后世子孙记住这一耻辱,不能让忠臣义士的善和乱臣贼子的恶混淆不清或湮没无闻,要让他们流芳百世或遗臭万年,永为鉴戒。其三,将当事人所记的史料原文照抄,不删削,不筛选,不褒贬,和盘托

收稿日期 2007-01-19

作者简介 胡予琪(1971年-)女,江西于都人,讲师,从事高校历史学教学与研究工作。

出,为的是让读者自己从中去了解是非曲直。

《三朝北盟会编》虽然资料丰富,所引书目有一百余种又是当时的史馆诸公所未见的,负责《高宗实录》编修的杨公辅等人,也曾奏请朝廷抄录此书作参考之用。但是,长期以来,此书却未能刻印出版,只有抄本流传。清代《四库全书》在收录此书时,窜改甚多,幸旧抄本尚存,今日印本才得以还其本来面目。

2 “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史书编纂的创立

2.1 袁枢与“纪事本末体”的创立

在宋代以前,我国的史书编纂体式不出编年体和纪传体两种。对于这两种体式的优缺点,唐代刘知几在《史通·二体》篇中做了比较。他指出,纪传体之长是能巨细无遗地记载历史,缺点是同一事件分在数篇,不连贯,难免重复,编年体之长是能将不同地域、不同人物共同经历的事件相对集中于发生的时间里,较少重复,缺点是一事延长数年者,则分记在数卷之中,使读者难以评其原委。这说明在宋以前的编辑家就在探讨克服纪传、编年二体缺点的办法了,但是受制于当时的史学积累和编辑水平,所以新体式既未肇端,更未出现。随着宋代读书风气的长兴不衰、编辑出版事业的发展,新的体式终于产生了,这就是南宋编辑家袁枢创立的“纪事本末体”。

袁枢,字机仲,建州建安(今福建建瓯)人。他自小爱读《通鉴》,但又苦其浩瀚。这是司马光生前自己也感到问题。袁枢经过长期探索,终于找到了解决这一难题的办法。他在出任严州教授时,采用“区别其事而贯通之”(《宋史·袁枢传》)^[9]的办法,将《通鉴》所记的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分别抄出,每事一篇,每篇标上一个标题。经过袁枢的改造,将一部以年为经、包括1362年历史、共计354卷的《资治通鉴》改编成以事为经、包括239个专题、共计42卷的《通鉴纪事本末》。篇幅缩减了一半。

袁枢所采用的专题归纳叙事方法,能给读者描绘出清晰、系统、完整的历史发展脉络。如对纷繁复杂的战国至秦这段历史,他只用了“三家分晋”、“秦并六国”、“豪杰亡秦”三个题目,便把历史的主线讲清楚了。

袁枢的“纪事本末体”是在继承传统的编年体式和“资鉴”的编辑思想的基础上加以创新的,其目的在于便阅读、利“治道”,所以受到读者的欢迎。当时的参知政事龚茂良将此书报告给孝宗时,孝宗便诏令臣僚们都得熟读它,说“治道尽在是矣”(《宋史·袁枢传》)^[9]。近代史学家梁启超说:“吾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非以事为主不可,纪事本末与吾侪理想之新史学最相近,抑亦旧史界进化之极轨也。”^[14]

纪事本末体的产生,从继承关系上说,它源于纪传、编年二体,又异于二体,成为古代历史编纂学上的第三大流派,突破刘知几在《史通·二体篇》中断言的“后来作者不出二途”^[9]的旧说。据《四库全书总目》收录,迄至清乾隆朝,纪事本末体史书已达26部,1273卷,成为史林中的一大系统。至此,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四大体裁已经完备,编年体创立于公元前4世纪孔子的《春秋》,纪传体创立于公元前1世纪司马迁的《史记》,典志体创立于公元9世纪杜佑的《通典》,到公元12世

纪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的出现,史书的四种编纂方法,即全备了。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历史编纂学上一大创造性的成就。

2.2 纲目体的创立

与《通鉴纪事本末》同时产生的另一部改编《资治通鉴》的书,是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它的出现,标志着纲目体的创立。所谓“纲目”,朱熹在《自序》中说:“表岁以年首,而因年以著统,大书以提要,而分注以备言。”^[9]他运用编年纪事法,将记注式和叙述式综合为一体。“大书以提要”,即用大字概括地叙述事件,顶格写,这便是纲要;“分注以备言”,即用小字详述细节,低格写,是为目,故称“纲目”。纲目式编年记事法,人称之为“纲目体”,这是历史编纂学的又一革新,是对历史编纂学的新贡献。这一方法对元、明、清史学有一定影响,在中国编辑史上也应有它的地位。

3 纪传体通史的创生:郑樵与《通志》

宋代的历史编纂学在继承与创新上,不仅编年体史学有重大突破,在纪传体通史的编纂上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这就是南宋博学家郑樵的《通志》和他的编辑思想。

3.1 郑樵的生平及其著述道路

郑樵(1104—1162),字渔仲,兴化莆田(今福建莆田)人。16岁那年父亲去世,家道中落。此后便到夹漈山造草屋三间,专心读书,故称夹漈先生。他曾三次拒绝“孝廉”举荐,两次拒绝“遗逸”推举,决心晓通百家之学;“集天下之书为一书”(郑樵《夹漈遗稿·上宰相书》)^[10],编纂一部贯通古今的通史。为此,他曾搜奇访古,寻觅藏书之家借宿攻读,也曾闭门著述,“忽忽三十年,不与人间流通事”(郑樵《夹漈遗稿·献皇帝书》)^[10],还曾三次赴京,请求朝廷恩准撰史,最终取得了私人编纂国史的许诺。到绍兴三十一年(1161)完成《通志》编篡,第二年郑樵便去世了,终年59岁。

3.2 《通志》的结构及内容

3.2.1 结构

《通志》共200卷,分帝纪18卷,后妃传2卷,年谱4卷,略51卷,列传125卷,共500余万字。在继承司马迁修史方法的基础上,《通志》有许多创新。

3.2.2 内容

应当说,郑樵《通志》一书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蕴藏着丰富的思想内容。其一,他强调历史编纂学上的继承与创新问题。继承与创新这一问题是一切文化建设中不可忽视的重大原则问题。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能只强调某一方面,更不能将其完全对立起来。因为历史在合乎其规律的发展中,有其连续性,又有其阶段性。只强调继承而不注重创新,便容易忽视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反之,只强调创新而不注重继承,便容易忽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规律。郑樵在编纂《通志》时,虽以司马迁的《史记》为样板,从旧史中吸取养分,但他不用诸史旧例,做到继承中有所创新,而不是简单的抄袭。他说:“凡著书者,虽秉前人之书,必自成一言。”(《通志·总序》)^[11]就是说,编纂史书既要师法古人,又要在前人的基础上大胆革新创造。

其二,他丰富了史书记载的内容,使纪传体史书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南宋之前,中国史书编纂已取得很大成就,出现

了不少名著。但编年体史书多偏重于政治史。杜佑的《通典》偏重于礼制,纪传体除政治史外,还有经济、文化方面的内容(如《史记》有“八书”,《汉书》有“十志”)。而郑樵在《通志》中,则把“志”改为“略”,而且大大扩充了“八书”、“十志”的范围,扩大为“二十略”。他认为其中十五略都是自己新增加的,只有五略是前人已有过的。从而他使纪传体史书“内容空前丰富,举凡姓氏、礼乐、文字源流、艺文、校讎、金石图谱、天文地理,乃至昆虫草木等,无所不包”^{[11]837}。

其三,他论证了治史必求会通的准则,使通史的内涵更为明朗。郑樵在《通志·总序》开头说:“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又说:“自书契以来,立言者虽多,惟仲尼以天纵之圣,故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11]11}

其四,他批判了灾祥、占候之说,提倡实学研究精神。封建时代的正统学者,为了神化皇权,往往利用宗教预言和迷信观点解经惑众,在他们的著作中或多或少都保留了一些灾祥、怪异之类的内容。郑樵生活在理学盛行的宋代,但对当时盛行的理学,却斥之为“语言之末”^{[11]837}。郑樵《通志·图谱》^{[11]837},靠耍嘴皮,而不注重实学。他也作《灾祥略》,但他却对这种错误东西进行了批判,称之为“欺天之学”^{[11]837}。郑樵《通志·灾祥略》^{[11]837}。“专以记实迹,削去五行相应之说”^{[11]837}。郑樵《通志·灾祥略》^{[11]837}。所以他的《灾祥略》只记某年、月、日于某地发生过地震,某地见日蚀,某时某地大水、大火等事件,处处联系到其对人民生活的影响,留下可供天文气象研究的重要资料。

其五,他总结出一套较为完整的校讎学理论。对于郑樵的《通志》,人们历来认为以其中二十略写得较精彩,而二十略中又以《校讎略》为最佳。研究者们多把它目为目录学理论专著,它在目录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然而,如果承认篇籍整理及编纂国史、类书、丛书、文集和图书编目等工作是中

国古代编辑工作的主要任务和活动的话,那么,郑樵《通志·校讎略》应是一部编辑学专著,是继刘向《叙录》和刘知几《史通》之后的第三部中国古典编辑学专著。

4 结语

综上所述,宋代在史学编辑出版事业的继承与创新领域,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历史编纂学体系。创造的通鉴体、纪事本末体、纲目体、通志体等史书编纂体式,对以后史学的发展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极大地促进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其成就和精神都值得我们努力继承和发扬。

参考文献:

- [1]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2187.
- [2]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北京:三联书店,2001:277.
- [3] 金毓黻.唐宋时代设馆修史制度考[J].说文月刊,1942,3(8):2.
- [4] 司马光.司马文正公家传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988.
- [5] 尹达.中国史学发展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238.
- [6] 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1934.
- [7]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过去之中国史学界[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24-25.
- [8] 郭维森,柳士镇.古代文化基础[M].长沙:岳麓书社,1985:203.
- [9] 胡庆世.中国文化通史[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6:337.
- [10] 郑樵.夹漈遗稿[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 [11] 郑樵.通志[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责任编辑 张振元]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Editing & Publishing Industry of Historiography of Song Dynasty

HU Yu-qi

(Kaife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Kaifeng 475004, Henan,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e of the inheritance of predecessor's results, experiences and methods and some innovations, a set of complete system for the historical compilation knowledge was established in Song Dynasty on the compil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 and books. The new compilation style of history books — “the history present in separate accounts of important events” and “the detailed outline” were created. The significant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were made by Zheng Qiao in his General Annuals in terms of the general history presented in a series of biographies, “Having a style of his own system of thoughts”.

Key Words: Song Dynasty; editing & publishing industry of historiography; inheritance; innovation; long chronicle; the history present in separate accounts of important events; the detailed outline; general history presented in a series of biographies